

马克思的工作日批判及其解放叙事

周露平

摘 要：资本来到世间，似乎创造出财富增长、工作平等与机会自由的新工作类型。社会生产是以工作日为计量单位的现代劳动方式。工作日才是创造世界的主体内容，建构起现代性世界。那么，工作日成为创造世界的时间规定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技术设计。但问题在于，这种工作日并不是人类天然与公正的，毋宁说是资本权力建构的时间设计与生产制度而已。只要没有上升到资本批判的高度，就无法澄清工作日的基本性质与具体内容。马克思直接以资本批判的视角进入现代世界及其生产机制，以工作日追问现代世界的资本性质、斗争视域与解放叙事：一方面，社会联合与自由劳动彼此建构起超越工作日的生产机制，即重建个人所有制，阻断工作日作为资本剥削的时间规制；另一方面，超越资本逻辑，建构合理的工作日模式，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主义中国需要发挥工作日的文明性，大力营造劳动光荣与勤劳奋斗的社会情境。

关键词：资本论；工作日批判；资本性质；解放叙事；经济哲学

中图分类号：A811.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23)04-0001-12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30526.001

资本来到世间，似乎创造出财富增长、工作平等与机会自由的新工作类型。人类进入以工作为主要内容的文明社会，比任何时候都能感受到工作（劳动的组织形态）创造财富的巨大力量。资本创造现代财富的文明新阶段，人类通过劳动时间的工厂化建制即工作日，进入财富生产的历史阶段。莫伊舍·普殊同（Moishe Pushton）认为，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劳动创造社会世界并且是所有财富的来源”“这一形式（即劳动——引者注）被作为现代性之基本特质的首要社会基础”^{[1](P5)}。但普殊同仅仅聚焦于劳动价值论的视域，反而忽视马克思批判资本与反抗工作日的根本诉求。

马克思全面诠释资本生产是以工作日为计量单位的现代性劳动，建构起宏大叙事的现代性世界；工作日成为物质财富生产的时间规定，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技术设计。就理论性质而言，这种工作日并非蕴含人类天然与公正的禀赋，毋宁说是资本权力建构的时间设计与生产制度而已。只要没有上升到资本批判的原则高度，就无法澄清工作日的基本性质与运行机制。因而就批判指向而言，只有马克思以批判视角进入现代世界及其生产机制，以工作日追问现代世界的资本性质、斗争视域与解放叙事，以形成现代性的瓦解路径。

一、工作日的扩张欲望与资本性质

古希腊的赫西俄德（Hesiod）以工作、时日与神谱三维视角，谱写神性时代的工作时间的诗意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资本论》及手稿的工作日批判及其双重效应”（2022BZX006）

作者简介：周露平，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woshizhouluping@126.com（上海 220001）

想象：宗教信仰在农业生产中如何取吉日舍凶日的生活判断。赫氏意在强调天意神性主导的工作时间，证实工作日是人类生活如何臣服于神性的必要环节，“诸神不让人类知道生活的办法，否则，你工作一天或许就能轻易获得足够的储备”，因为“愤怒的宙斯不让人类知道谋生之法”^{[2](P2)}。这似乎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有相通之处。马克斯·韦伯以理性主义(经济导向)与劳动天职(文化气质)作为考察现代资本的双重维度，意在将宗教信仰之时间机制转换为工作生产之时间天职。在经济传统主义看来，劳动时间的花费无疑是必要的付出，但也是一种灾难性的事件，因为时间被强制分配于闲暇、生存、友情与社会交往之外的区域。与之相对，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将劳动天职意识内嵌至日常生活精神，塑造出破解宗教禁欲主义的社会责任与历史动力。简言之，马克斯·韦伯的思考意在激活我们对工作的美好想象：人类可以通过工作日改变世界，为人类创造无限的光明前景。

(一) 工作日的思想史回响

资本固化工作日为无产阶级的生存形式，是资本统治的鲜明特质。与之相应，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不断以资本合理性作为理论立场，论证工作日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制度形式。

一是工作日是劳动创造价值的时间设计。古典经济学是对资本建构世界的理论回应，以科学诉求与严谨理论论证资本增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他们以利己主义与原子个人作为理论原则：利己主义的经济学表述就是利益最大化与利润最优；原子个人是理性经济人，为资本增殖不断提供制度设计与生产能力的经济人格化。就此而言，古典经济学无法证实这样的事实：资本激活对利润与财富的全部想象，以新的增殖积累方式不断驱逐传统的习俗工作时间。“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呼吁，在‘积累’的逻辑基础上塑造社会，从而加强社会对雇佣劳动的依赖性。”^{[3](P7)}一方面，工作日被掩盖于政治诉求。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将劳动作为价值之来源，并以此划分三大收入，即资本的利润、劳动者的工资与地主的地租等。但问题在于，亚当·斯密等人将工作日扩大到整个社会阶层，从而忽视工作日只是无产阶级的专属内容，这就是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政治立场与价值诉求。另一方面，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证实，工作日作为世俗化的社会机制，固化为整个社会的生存形式。申言之，工作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天职，工作日是这种劳动天职的时间机制——一方面要将工作日形式的劳动作为世俗化内容；另一方面要有不断贡献生命时间于工作日的理性设计，“把劳动视为一种天职成了现代工人的特征，一如对获利的相应态度成了商人的特征”^{[4](P272)}。因此，工作日其实就是限制与废除节假日的时间耗费，以取代诸如节假日的同时，促使休息时间与节假日时间全方位转换为工作日时间，这是古典经济学要论证的重要内容。

二是工作日是自由交往、财富平等的基础。工作日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设计，最能彰显资本与财富关系的实践导向。亚当·斯密的核心思想是市场能够带来经济的和谐，而工作日直接提高工人的利益。因为工资是一种经济契约关系，决定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价格商谈，“劳动者的普通工资，到处都取决于劳资双方所订的契约”^{[5](P61)}。工作日直接关系到工人的收入，表现为资本让渡给工人的利益。由于亚当·斯密的理论目的与论证立场，他并未对工作日的时长与工资的关系作出判断，只是在工作日的限度内提出工人的最低工资内容，以符合人道主义要求。可以看到，早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作日时间大多在15小时至20小时之间，这样的时长严重违背道德。但亚当·斯密并未对此加以谴责，只是站在财富增长的立场上，认为只要保障工人生存就可以。正如迈克尔·佩罗曼(Michael Perelman)所言，古典经济学只是以自己的设想(有教益的强制劳动)建构理想的工作日，“在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乌托邦中，穷人在醒着的每一时刻都在工作”^{[3](P7)}。洛克、卢梭与黑格尔也讨论过工作日问题，但他们认为资本吸附劳动不需要受到劳动者的年龄限制与生理制约^{[3](P7-8)}。因此，他们与亚当·斯密一样，都认同超长工作日的合理性。

三是工作日是劳资平等的制度改造对象。马克思曾批判过，小资产阶级试图以商品交往关系作

为改良社会矛盾的药方，一方面使得商品生产永恒化，另一方面试图以暴力方式消解货币，改良社会。那么他们必须将商品生产作为一种调节社会运行的手段。这种想法发展到顶点就是银行改革与“发放小时券”：前者改造银行功能，以防止货币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后者以固定工作日时间，防止资本对时间的无限度剥削。蒲鲁东主义的思路是以工作日作为制度设计对象，以防止在工作与劳动过程中形成剥削。但问题在于，他们并未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与现代商品制度的生成关系，而只是对劳动时间加以抽象规制。

简言之，近代思想家对工作日分析并未展示出资本残酷剥削的社会内容，诸如资本对生命时间的控制、工人身体的操作及其对剩余价值的把控等。尽管有人看到工作日生产的矛盾性，如西斯蒙第（Sismondi）面向工作日中的资本生产弊端，提出一种实证主义批判，即工作日的财富生产是为人，还是为物的。尽管他已经意识到财富与人的对峙问题，但只要没有破解工作日的剥削机制，那么这种批判本身必定是浪漫主义的。因此，只要没有上升至对资本批判的高度，那么工作日仍然是资本生产积累的最有效形式。

（二）工作日与资本逻辑的协同演进

前《资本论》时期，马克思关于工作日的思考是潜在的，并未凸显为一种批判术语。《德意志意识形态》回顾资本生产的生成过程，如等级资本、商业资本（流动资本）与工业资本，意在诠释作为工业生产的时间筹划问题，即工作日已经成为组织化生存的时间规定。等级资本的行会手工业时代，“前店后场（厂）”的模式证实生产时间与流通时间的界限融合；商品资本时代将商品流通提升至经济活动的核心地位，工作日作为商品生产交往的前提已经隐性地凸显出来。因为支配庞大的商品生产需要两大内容：工场手工业与世界市场。前者需要工作时间的规范限制；后者需要工作日的世界性确立。工业资本的机器化生产将工作日作为基础性设置，工作日的生产者被全球化性定义为“工人”，“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6]（P567）}。同样，《共产党宣言》以全球化视角考察资本与工作之间的关系。一是工业革命造就大工业的工作日内容。“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7]（P36）}，以机器厂房等物质形式不断吸附无产阶级进入工厂工作，接受工作日的强制规训与残酷剥削。二是工作日作为资本生产的时间组织形式，随着世界市场而得以全球化，这种劳动时间的设计模式被推广至世界各个角落。三是工作日是劳资对峙的阶级斗争舞台。一直到《资本论》及手稿，马克思才正式将工作日作为显性术语且重点予以考察，正面证实资本逻辑的运行机制与剥削形式——资本逻辑凌驾于人类的工作日时代。“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和，工人生产他的劳动力的补偿价值的时间和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之和，构成他的劳动时间的绝对量——工作日”^{[8]（P266）}，成为资本剥削制度的最基本的时间设计——人类可以通过高度组织化、严密结构化的分工形式，以时间规制方式控制无产阶级工作期间的生命时间^①。同时，以高度技术化内容将之转化为生产必要劳动与剩余时间，这就是资本逻辑的工作日实质。资本逻辑优化工作日生产，即资本逻辑通过两种形式剥削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一种是绝对剩余价值形式，通过最大限度延长工作日时间；另一种则是资本逻辑以技术化形式优化工作日，侧重于相对缩短必要劳动，以获取相对剩余劳动的技术设计。

^① 在资本那里，无产阶级的生命时间都是劳动时间，即“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应当用于资本的自行增殖。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国家里）——这全都是废话”。具体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6页。

一方面，工作日是资本逻辑的时间规定。资本以机器、厂房及原材料等构成工作日生产的物质内容，它们是工作日所蕴含的不变资本。虽然这部分不能形成资本增值的权力逻辑与经济逻辑的任何可能，但这恰恰是资本逻辑的时间条件，构成资本增值的“形式因”——作为一种物质内容的形式规定已经隐置于生产关系之内。资本必须吸附无产阶级的劳动力，以获取剩余劳动，即超出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才能形成价值增值。没有劳动力的参与，资本增值就无从可能，因而劳动力是资本价值增值的“质料因”——劳动力商品作为可变资本只有与不变资本结合，才能为资本逻辑提供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的基础上的”^{[8](P495)}。工作日为资本增值提供时间规定：一方面工作日通过绝对或相对延长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以获取剩余价值，因而资本“惟一关心的是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8](P307)}，这是工作日的时间逻辑；另一方面工作日提供可能突破社会界限与生理界限的技术手段与空间条件——以法律机制、技术手段等占有工人的生命时间，最大限度释放劳动时间，创造尽可能多的社会财富（剩余价值）。

另一方面，工作日是资本逻辑的扩张欲望聚焦。资本逻辑本质上是资本增值的技术逻辑与权力逻辑，体现为资本剥削工人的社会权力，“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9](P49)}。工作日充分彰显出资本逻辑的权力欲望。一是对生命时间的占有欲望。包括哲学家、经济学家在内的人都坚持认为，年龄不应成为工作日的生理界限，以防止工作日的时间浪费。诸如约瑟夫·汤森（Joseph Thomson）、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弗莱彻（Fletcher）、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与约翰·洛克等都主张要让孩子早工作。如洛克“呼吁说，在3岁‘成熟年龄’就可以开始工作”^{[3](P8)}。二是对劳动力身体的支配欲望。各个济贫所的存在目的是以技术化手段将贫困者的身体纳入工作日生产。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的“大禁闭”运动，其目的不是致力于贫困者生存改善，而是通过集中培训与职业教育等逼迫贫困者重新劳动，以满足资本对工作日的诉求。三是对剩余增值的占有欲望。工作日的存在形式，凸显出资本无限占有剩余价值的欲望。工作日聚集诸如机器、厂房、原材料与工人等，意在如何在规定的时空内容，要么以延长工作日的方式，要么以调整工作日构成的方式，来满足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欲望。马克思特别指出，工作日的机器化生产，极大满足资本剥削诉求，创造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的强大动机；同时变革社会生产性质，以促使资本生产的永恒性，故“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8](P469)}。这是全新的“机器与工作日”的否定辩证法：机器本是缩短工作日的技术条件，却转换为资本实现占有欲望的支配手段。两者的融合聚焦为资本无限地控制工作日，以最大限度地剥削剩余价值。因此，马克思称之为“经济学上的悖论”。

简言之，工作日隐匿生产过程与增值过程的界限。购买劳动者的工资部分，构成两大内容：劳动过程与价值增值的深度统一。劳动过程是生产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劳动表现为工资部分，剩余劳动就是价值增值部分。工作日的劳动过程有两大特质：一个是工作日期间的工人劳动全部属于资本家；另一个是生产的全部产品属于资本，而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因此，在工作日期间，工人“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8](P218)}。这样的目的是创造劳动凝缩与生产固化，以凸显资本的扩张欲望。

（三）工作日的资本性质与现实指向

就哲学性质而言，工作日是资本全面控制劳动者的时间幅度。工作日容易遮蔽劳资对峙的阶级斗争图景，营造一种幻象化的公平交换之阴谋机制——资本权力机制与积累机制的有机规制。换言之，工作日极度彰显为一种剥削程序的计算机制——资本以其时间逻辑形式，以最为精准化方式（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比例关系）深度切入剩余价值的形成规划，并以理性原则加以固化。故就《资本论》及手稿的研究宗旨而言，工作日作为一种时间维度深嵌至资本增值的权力机制，以资本逻辑形式强制剥削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因为在一方创造出剩余劳动，所以在另一方才创造出非

劳动和剩余财富”^{[9](P380)}。

首先，工作日是资本剥削的制度设计与优化保障。工作日是资本剥削工人的时间界限，彰显资本增殖的组织形式与结构形式。一是工作日的主体内容是劳动力商品。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内容就是劳动力成为商品。那么，什么是资本逻辑呢？资本逻辑就是资本剥削无产阶级，以剩余价值作为特殊基质，实现自我生产积累的社会运行机制^[10]。如何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无疑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设计与优化抉择。这种突破口就是以时空界限控制工人，以工作日为手段，最大限度剥削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二是以“虚假”的自由交往作为制度方式。工作日作为工厂、机器与分工的制度设计，以自由交往的形式吸附工人。一方面体现出自由平等的社会建制，如自由工人的社会交往；另一方面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强制性。资本设计出工作日制度，开创一个崭新的组织化生产方式，故“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8](P198)}。工作日外部表征为劳资的自由平等关系，但这种自由交往仅限于劳动力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层面，仍严格从属于资本剥削的制度设计。三是工作日彰显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化动力。尽管工作日的时间限度有一种自然和道德的因素，即工作日不能超过工人的生理时间，也不能违背社会基本道德规范，但是资本以机械化或技术化手段优化工作日的生产时间。

其次，工作日是资本权力的现实化。资本作为一种统治世界的经济权力，需要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秩序形式予以实现。工作日是资本权力剥削剩余劳动的时间条件，以时间作为显性表达，不断吸附工人进入工厂空间。换言之，工作日建构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内容：没有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就不会有现代性时间的整体性发育。一方面，工作日强制吸附工人的实体元素。这些实体元素主要包括身体、精力、思维、情感等，它们构成资本增殖的物化源泉，工作日是这种物化源泉的时间界限。以身体元素为例。拉美特利（La Mettrie）的“人是机器”说，恰恰以生物功能学诠释了将身体纳入现代生产体系中的尴尬境遇。身体如同机器，与工作日同频共振才会有价值。由此，拉美特利以唯物主义视角揭开工作日的基本向度：工作日是身体进行物质化运动的时间跨度，是资本作为经济权力控制身体的过程。另一方面，工作日彰显资本剥削的形式规定。工作日将人类的生存时间不断转换为资本增殖的工作时间，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高度抽象性作为社会关系，不断规定、统摄与通约生产内容，实现工作日生产过程中资本增殖的精准计量与精确把控。如普殊同认为，劳动日是抽象时间，即工作日仅仅被看成一种商品交往意义上的劳动时间，“抽象时间概念的历史起源，应当依据这种时间随着商品性社会关系形式的传播而建构的社会现实来理解”^{[1](P236)}。申言之，工作日是资本权力建构下的劳动时间，而非简单商品学意义上的生产时间。它们指向这样的现实：工作日从实体元素与形式规定的双重维度，实现资本将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转换为剩余价值的全部过程，彰显出资本的经济权力与社会关系的全部内容。

最后，资本逻辑塑造出工作日的运行机制。马克思交代工作日的起源、运行与结构等内容，意在揭示出现代资本主义所要囊括的所有内容，诸如商品理论、货币理论、资本生产积累理论、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资本循环周转理论、平均利润率下降理论、危机理论、信用理论等。就存在形式而言，工作日是两大阶级对峙与斗争的时间聚焦，但也揭示出现代资本主义生成的内在机制与本质规律。申言之，工作日是资本逻辑的时间规制与实现机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工作日是资本逻辑的历史前提。工作日作为新劳动组织样式，以破解传统世界的人身依附与等级特权。因此，人的工作化生存成为资本逻辑的历史性前提，工作日是资本的历史性前提的存在形式。二是工作日是资本逻辑的现实基础。劳动力成为商品并进入工厂工作完成工作日生产，这是资本逻辑的现实基础。劳动力商品与工作日成为资本逻辑的基础要件，直接决定资本强制剥削剩余价值的现实性。三是工作日是资本逻辑的权力机制的高度聚焦。《资本论》及手稿以很大篇幅交代工作日问题，揭示出资本如何以工作日绝对性剥削无产阶级，充分凸显资本逻辑的权力机制，如绝对延长工作日，

“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的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它靠缩短工人的寿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8](P307)}。简言之，资本逻辑就是将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转化为工作日的生产时间的权力逻辑。

总之，工作日是资本经济权力的时间规制，是不断变革的新型权力技术。尽管随着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与平台经济等的不断兴起，与之相应的无人工厂与无人市场的出现，似乎重新塑造着工作日的存在样态及其超越可能。如前所述，只要资本存在，工作日就必定呈现为资本的时间剥削机制，深度控制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时间。

二、工作日的多维反思与辩证阐释

古典政治经济学以科学形态证实，财富增长方案只有通过工作日得以实现。尽管资本与市场经济通过工作日造就财富极速增长，但这种增长本身根植于对劳动者的剩余劳动的无限剥削。工作日蕴含着阶级斗争与革命命运的多维可能。西方学界提供调和与改善劳资对立的理论主张，但并未真正解决资本逻辑的剥削现实。如罗伯特·博耶（Robert Boyer）的调节学派，试图以劳动-工资关系的弹性调节改善劳资对峙。他的做法就是调节劳动内容，改善工资结构，缓解工人压力，以劳动与工资的关系取代劳资对峙关系。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认为消费社会消解工作日，社会重心已经从工厂生产转移到日常生活消费，消费成为社会的中心。他建议建构工作日的消费价值系统，“这价值体系的重心从个体企业主及个人储蓄者这些竞争资本主义的先驱转向了个体消费者，并且同时像技术官僚结构的扩张那样，拓展为个体的总和”^{[11](P54)}。同时，工作日变成消费日（节日），消费社会是“与新型生产力的出现以及一种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的垄断性调整相适应的一种新的特定社会化模式”^{[11](P52)}。

必须应对这样的“理论乐观”，它毋宁说是理论陷阱：数字化时代改变了工作日的社会性质，工作日俨然成为历史遗迹，《资本论》及其工作日批判业已过时。的确可以看到，人工智能时代的数字劳动全面颠覆物质劳动的工作日强制，工作日似乎退隐至历史深处。数字化生存如网络游戏、社交媒体等改变人的工作方式，改写资本剥削的机制构成。如《资本论》中工作日的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的划分，到社交媒体变成在线时间——是生命时间全部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在企业社交媒体如谷歌、‘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和 YouTube 上的所有在线时间都是剩余劳动时间”^{[12](P141)}。它指向这样的问题：随着物质性劳动消失，虚拟劳动或数字劳动成为社会生产与价值增殖的全部内容。简言之，这些都指向一个乐观性的理论自觉：随着调节生产、消费主义、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等兴起，马克思的工作日批判业已过时。那么，事实是如此吗？我们以为，只要资本逻辑作为整个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那么工作日作为资本剥削的机制设计必将存在，阶级斗争也必定存在，因而马克思对工作日的批判依旧有效。

（一）工作日争议的多维反思

关于工作日的长短问题，一直存有多维争议。早在《神圣家族》时，恩格斯就批判过茹尔·法赫尔（Jules Faucher）的《英国的迫切问题》中的“10 小时工作制”：法赫尔以自由意识作为想象，设计工作时间，但是并未面向资本主义工作日的实质。同样，蒲鲁东（Proudhon）以所有权作为武器，对现代私有制加以批判。他诉诸小生产者的私有财产即工资，以维护这个群体的利益，防止“所有权的盗窃”。换言之，把握工作日（劳动时间）是防范所有权窃取工资的时间限度，“蒲鲁东把劳动时间，即人类活动本身的直接定在，当做工资和产品价值规定的尺度”^{[6](P270)}。显然，他的工资平等其实就是工资日平等。就理论性质而言，诸如法赫尔、蒲鲁东等的工作日反思或批判，只

要没有上升至资本批判的原则高度，很容易导致四种根深蒂固的误解。

第一是“工资日就是工作日”的误解。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资本家付给工人工资，就有权力占有工人的工作日。显然这种误解在于混淆必要劳动时间与生产劳动时间，而掩饰剩余劳动时间的来源问题。那么，它必然延伸为，工资是平等的方式，且能够占有工人的全部生产时间。但这忽视了工作日的历史因素与社会禀赋之间的差异。一方面，工资是一个历史概念，存在于其他社会形态之中，是劳动报酬的支付方式。但工作日恰恰是资本的文明性创造且包含两大内容：除去工资即必要劳动（工资）之外，还应包含着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生产，故两者不能混淆。另一方面，工资体现为社会支付形式的自然性质，而工作日则表现为社会关系的支配形式，同样也不能混淆，“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切反抗；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从而把工资限制在与资本增殖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以内”^{[8](P846)}。

第二是“缩短工作日就可以解决剥削问题”的误解。英国经济学家纳索·威廉·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认为，资本剥削形成于工作日的“最后一个小时”。“在最后一个小时生产你们的剩余价值或纯利润。”^{[8](P261)}由此，只要缩短工作日就能解决剥削问题，无疑是一种浪漫主义批判。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提高生产力、缩短工作日，其本质目的仍然是缩短工资部分，进而相对延长剩余劳动。“它的目的只是为了缩短生产一定量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8](P372-373)}申言之，缩短工作日其实只是技术变革与生产力提高之结果，而绝非前提。

第三是“工作日的解放作用在于给农民以工作”的误解。《资本论》专门以“所谓资本原始积累”来说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与运作固化在于资本运动的自我生成。工作日只是这种原始积累的后果，直接印证资本残酷性的本质。旧社会结构的农民生存高度依附于土地，但随着原始积累的强制剥夺，以法律惩罚形式，强迫农民、手工业者等接受为资本工作。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文本详细考察原始积累的掠夺性与残酷性，“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运用国家权力。这是所谓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8](P847)}，故工作日是资本剥削失去土地的农民，强制赋予后者以工作的直接证明。

第四是“智能生产与数字化生产消解工作日”的误解。智能化与数字化生产塑造出一个个无人工厂，但它们却渗透至人类的生命时间与生活时间，将之全部变成社会生产时间。正如福克斯所言，“人类的所有时间趋向于变成受资本剥削而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12](P171)}。数字化生存与智能化实践，摧毁工作日的时限度，即将工作本身变成一种日常化生活：工作日的物质性生产转化为数字化、信息化生产的非物质劳动，且等同于生活劳动与家务劳动等非剥削性劳动。我们以为，智能生产与数字劳动体现出数字资本对体力劳动剥削的隐匿化，其实更多地聚焦对全社会的智力劳动的全生命周期性剥削。换言之，现代智能生产与数字化生存高度模糊工作日与生活日之间的严格界限，表现为对智力劳动的全天候剥削。

以上这些误解的形成，是工作日的文明性与否定性的断裂式理解：这种文明性过分夸大工资的智能，意在将工作日还原为工资日，故工作日批判仅仅被把握为工资批判。这使得批判本身布满意识形态之陷阱：劳资平等、交往自由与等价交换等文明之表现形式；围绕工作日的否定性批判，凸显为一种抽象的劳动原则，反抗资本剥削的伦理主义批判，意在强调“工作日就是劳动日”。这种否定性其实陷入劳动公平之拜物教幻象：劳动成为每个人的必须存在形式，工作日能彰显劳动生产的平等向度。殊不知这种劳动本身却是异化劳动或雇佣劳动，是谋生活动^{[6](P124)}。只有马克思真正破解这样的意识形态陷阱。

（二）工作日文明性与否定性的辩证阐释

只有马克思真正辩证地呈现工作日的文明性与否定性关联。《资本论》及手稿及其其他文本都

证实,工作日是资本创造文明世界的工作模式,却具有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性质。

一方面,工作日的文明性在于,资本主义的工作日设计无疑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创举。它首先表现为,工作日彰显出自由平等之可能的社会形式。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从历史进程中隐性揭示出工作日的文明性内容。第一大社会形态是以等级与特权为形式,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内容的社会形态,人高度依存于社会整体性权力建制。第二大社会形态则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内容,以工作日生产为形式的社会形态。工作日使人摆脱高度的依附关系,变成自由平等的雇佣劳动关系。劳动者以自由平等形式进入资本生产的全部过程。第二大社会形态的工作日为第三大社会形态提供操作原则与路径方法。如“缩短工作日”与人的自由全面解放关系问题^{[13](P928-929)}。

工作日是现代生活的标志,塑造现代生存风格,由此工作日塑造出三大生存世界。一是商品化生存世界。工作日是资本剥削工人的时间规定,同时也生产出庞大的商品机制。商品成为工作日与生活日之间的物质桥梁,建构社会全面的生存内容。二是货币化生存世界。工作日就表象而言,主要体现为以货币交往手段,资本支付货币给工人;工人服从工作日生产的自由公平形式。工作日的货币交往扩宽社会生存的时间极限:货币成为工作日内外的自由兑换形式,要么形成支配工人的资本形式,要么是工人生存的保障条件。货币使得工作日更加精准化与加速化。三是资本化生存世界。资本逻辑作为社会机制,是统治社会的根本力量,其发生空间就在工作日之中。马克思以大量事实揭示出资本要么延长工作日,要么技术化改造工人,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剥削剩余价值。由此,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强制吮吸欲望,从而将工作日推广至整个社会。

另一方面,工作日的否定性在于以时间为界限,最大限度剥削无产阶级。首先,工作日无底线地吸附劳动力商品。一是突破法律限制,恶意延长工作日时间。资本家无限度地压榨无产阶级,马克思大量引用诸如约翰·威德(Wade Johan)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伊登(Eden, F. M.)爵士的《贫民的状况》等材料作为佐证。二是残酷剥削未成年人。伦敦《每日电讯》《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公共卫生。第3号报告》等文件,都证实资本如何吸引大量未成年人且极大延长他们的工作日,致使他们罹患各种疾病与身体发育畸形。三是工作日是无产阶级的苦难日。资本家以繁重体力劳动与超长工作时间压榨工人,同时以各种伪劣食物应付过度劳动的工人。如马克思大量引用《就面包工人的申述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以伦理主义视角呈现这样的事实:工人“不知道,他每天吃的面包中含有一定量的人汗,并且混杂着脓血、蜘蛛网、死蟑螂和发霉的德国酵母,更不用提明矾、砂砾以及其他可口的矿物质”^{[8](P289)}。

其次,资本创新工作日的结构、拓展空间维度。一是时间结构的技术调整。如日工和夜工的换班制度。为应付工人的生理极限,资本创新性地将工作日的结构延伸至自然日的界限之外,以满足自我增殖的极限需要。二是空间结构的深度拓展。尽管没有改变工作日的时间长度,但资本可以通过生产资料扩张,加速机器运转、建立世界市场与全球化贸易,使得工作日不仅局限于厂房内的时间规定,而是拓展为空间化的生产机制。三是时空互动的生存固化。工作日作为资本增殖的时间维度,同时更是空间规制。工作日涉及工厂生产的时间空间规制的同时,还关涉到整个社会生存时间的节约与加速。如快速发展的现代科技,意在强制缩短工作日,改造社会生存方式,促使资本增殖加速。巨大震荡的社会变迁,调整或变革工作日制度,不断占用与支配无产阶级的消费时间与休息时间。有机协调的生活方式,严格屈从于资本支配。资本通过工作日生产塑造出现代生活方式。如休闲娱乐、网络游戏、网络购物都是工作日的社会化延伸。所以,现代生存方式的一个重大表现于时间匮乏与空间消解:生命时间已变成工作日生产时间;虚拟与现实的界限消解,都成为工作日生产空间。

最后,工作日致使无产阶级贫困化。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缩短工作日,但这种缩短是建立在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前提之上的,以强制性提高劳动力的生产速度,“强制缩短工作日,大大地

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条件的节约，同时迫使工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增加劳动消耗，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更紧密地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8](P471-472)}。资本以最优化的形式加剧生产，不断吸附工人的休息时间，以填充工人的工作日时间浪费。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的加速理论意在说明，时间加速不仅局限于工作日的节约，而且整个社会化生存都在加速，以溢出大量的生产时间，服务于资本剥削。罗萨延续着齐美尔（Georg Simmel）与勒范恩（Robert Levine）的工作日定义，提出加速的核心问题，“这种加速可以定义为，在一定时间单位当中行动事件量或体验事件量的增加”^{[14](P21)}。申言之，工作日的劳动时间与劳动事件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是对无产阶级的时间规划之强制。这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劳动时间的相对延长与工作日加速，加剧现代工人的生存世界的极度贫困：工人贫困、生态贫困、精神贫困与全球贫困^[15]。就本质而言，无论是失去生产资料的绝对贫困，还是劳资对峙关系的相对贫困，都聚焦资本以工作日形式控制无产阶级的残酷事实。

总之，工作日是资本剥削无产阶级的时间规制，同时它以所谓“自由平等”的工资形式消解剥削职能的任何痕迹，“工资的形式消灭了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一切痕迹。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有酬劳动”^{[8](619)}，这是工作日所表现出来的全面虚假性内容。

三、工作日的时代变迁与解放图景

无论是机器厂房式的工作日内容，还是数字化生存的工作日构成，只要资本逻辑支配现代生产，马克思的工作日批判理论就不会过时。马克思的工作日批判理论必定是我们澄清现代生产机制、批判资本逻辑的理论武器，同时也是我们走向未来世界、实现人类解放的基本原则。

（一）工作日的时代变迁并未改变资本剥削实质

由于智能时代与数字资本的来临，工作日的生产界限与社会定位发生巨大变化。第一，非物质化生产占据社会主导，劳动时间不再确定。这必然导致劳动时间、休闲时间与休息时间三者的高度模糊。第二，智能化生产不断取代工人生产，传统的劳动模式发生沿革变迁，必然出现智能取代工人、机器排挤工人、信息淘汰工人等现象。工作日本身对工人而言变成耗费全部生命时间的工作想象。第三，劳动创造价值语境下的工作日设计，由于数字化模式的入侵，“机器与智能创造价值”似乎成为一种历史趋势：智能时间不断取代工人生产的自然时间。

尽管有很多经济学家与哲学家们提供社会改造方案，直接牵连着工作日的变革诉求。他们着力于诸如缩短工作日、调节劳资关系与缓和阶级矛盾等理论论证。如罗伯特·博耶（Robert Boyer）的调节机制研究、德里克（Dirlik）的弹性生产探讨、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信息转换拓展等。这些思考仅提供一种模糊化的解放图景，并未真正把握住现代工作日的资本性质与运行机制。但如前所述，只要没有切入现代资本运动的核心问题，就不可能真正指向工作日实质。假如仅以此推进，就很容易得出只要无限缩短工作日，就可完成人类解放之重任的误解。这正是马克思所极力批判的理论内容。

（二）工作日批判成为人类解放的重要考察视角

只有深度切入现代资本运动，工作日才能为人类解放开辟出新批判视角。首先，工作日的阶级视角。工作日从生产本质高度揭示出劳资关系的平等性只能存在于市场交往或商品交换，即货币与劳动力交换关系之中，而其剥削机制的不平等深嵌于资本生产领域。工作日实质是资本控制无产阶级的时间权力，主要以商品、货币形式予以表达。劳动力成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的社会核心，货币完成商品交换与雇佣劳动的权力设置。由此工作日蕴含着资本支配劳动力商品的社会权力。申言之，货币与工作日（商品生产）的联合，共同塑造出资本家统治的私人权力，“社会权力就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8](P156)}。换言之，工作日的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划分，表现为资本控制

着工作日获取剩余价值，以满足自我增殖的基本诉求。

其次，工作日的时间视角。工作日是生产包含剩余价值的劳动时间，直接决定资本剥削的性质与内容。《资本论》的“所谓原始积累”证实过工作日的官方行动。如伊丽莎白一世、爱德华六世、亨利八世与詹姆斯一世等高压惩罚失去生活资料的流浪者，迫使其进入工厂，以强制肉体工作的形式献祭给工作日。但问题在于，只要资本逻辑是整个社会的基本原则，那么工作日必定是资本逻辑的权力机制的组成部分。因而威廉·魏特林（Wilhelm Christian Weitling）所言无疑是错误的——只要劳动是异化的，必定是人类的苦难之根源，那“劳动时间的缩短和工种的变换将使劳动变成一件愉快的事”^{[16](P13)}。

最后，工作日生产的变迁视角。这聚焦为三大变迁视角。一是人类交往形式的内在变迁。工作日使得人类更集中时间优化生产与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二是财富创造机制的升级换代。传统的农业生产以土地劳动作为时间衡量，财富创造依附于土地生产，但又绝对受制于后者，因为土地化生产是强制劳动，故不能严格区分开生产时间与生命时间的界限，劳动者创造财富的生命欲望与动力机制不可能被激发。现代财富是以抽象劳动机制作为手段，工作日则是生产的时间保障。三是工作日的弥散化存在。智能数字化生产，消解工作日与生活日之间的界限。数字化劳动驱使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隐性的工作日。换言之，工作日俨然变成每个人每时每刻的工作时间。只有把握住工作日的变迁视角，才能真正切入现代世界的资本运动，为超越资本逻辑与建构合理的工作日模式提供现实依据。

（三）工作日批判的解放图景展示

工作日的批判视角深度契合着人类解放的所有图景，可以预先呈现共产主义的生产机制。具体而言，工作日批判联系着人类解放的双重向度。一种是社会层面：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瓦解资本逻辑，从根本上消灭“资本-工作日”的生产机制。因而那些工作日缩短就能优化社会的幻想无疑是错误的。无论是8小时工作日，或者更少的劳动时间，只要没有达到资本批判的原则高度，那么仍然是资本剥削机制下的工作时间。“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缩短工人必须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以此来延长工人能够无偿地为资本家劳动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8](P373)}，仅此而已。因此，个人所有制不再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占有，而是以公有制为内容，以实现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内在统一，“在必然性领域内完全实现自动化，将打开自由的时间向度，即人的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得以形成的向度。这将是朝向一种新文明的历史的超越”^{[17](P31)}。

具体而言，一方面，资本与工作日的有机结构被自由劳动所取代。工作日是雇佣劳动的时间界定，是异化劳动（是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的生产性劳动）的资本设计。所以在社会层面上实现自由劳动，以取代工作日所牵涉着资本剥削剩余劳动的异化进程。另一方面，这种个人所有制就是以联合生产取代工作日，进而实现人类解放议题，“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13](P928)}。社会联合与自由劳动彼此建构起超越工作日的生产机制。

另一种是个人层面：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一种设想认为，工作日能够提供自由发展的社会条件，即工作日的优化设计，可以提供更多的自由时间，就必定可以提供自由发展内容。就资本文明性而言，工作日的生产机制消解高度人身依附关系与等级特权，使得自由全面发展成为一种历史可能。但显然这种可能仅限于资产阶级本身，而不是面向整个人类世界。尤尔（Ure A.）的《工厂哲学》混淆工作日与休息日，认为工作日具有自由发展的时间向度。我们以为，只要资本生产机制下的工作日存在，就不能有自由发展之向度。马克思认为，“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13](P929)}。工作日缩短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问

题在于消灭资本的制度设计。因而仍以资本作为社会组织原则，那么工作日无论如何缩短，仍然是一种强制剥削的社会制度，不可能实现人类解放。《资本论》及手稿等证实，工作日不再表现为资本剥削无产阶级的现实，而是自由时间应该成为社会所有制的运行基础，这是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与表现。

因此，一方面，超越资本逻辑，消灭工作日模式，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公共占有，才能真正消除负载于社会劳动的资本逻辑。在此基础上，个人全部占有社会生产内容，进而推动自由发展的个性实现，“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9](P112)}。另一方面，工作日形成于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内容的资本主义社会，与之相对，消灭资本及其所有的私有制就能消除工作日的异化时间控制。那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会实现，即自由个性的真正实现，因为它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9](P107-108)}。简言之，消灭资本，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最终使得劳动规制不再以工作日形式不断被生产出来。

（四）马克思工作日批判的时代启示

与资本主义工作日迥异的是，社会主义工作日或工作日的社会主义性质使得工作日具有创造财富、自由发展的文明属性。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社会成员通过努力工作与勤劳奋斗，以工作日的劳动创造美好的社会内容，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工作日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通过劳动者的工作日创造出大量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通过社会主义工作日创造劳动光荣、生产幸福的社会精神。故在利用工作日、提高生产力的前提下，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质量，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彰显出“社会-工作日”的历史解放内容，阻止“资本-工作日”的生产机制对人民群众的钳制与剥削。因此，我们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社会主义工作日是劳动者创造财富的奋斗时间。美好生活需要社会大众的拼搏奋斗，即中国式现代化的幸福生活都是干出来的。二是社会主义工作日是劳动者的自我解放的拼搏时间。要发扬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实干精神，通过社会主义工作日拼搏社会事业，为社会主义的高质量发展及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物质支撑。三是社会主义工作日是劳动者实现自我价值的创造性时间。社会主义事业需要人民大众的工作劳动，同时也是劳动者通过工作日实现自我价值的创造性时间，彰显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与人民群众价值实现的高度统一。简言之，社会主义中国需要发挥工作日的文明性，大力营造劳动光荣与勤劳奋斗的社会情境，最终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总之，马克思讨论未来社会时，聚焦资本批判与工作日批判的内在融合。无论是个人层面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还是社会层面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未来的历史趋势必然是人类解放的劳动时间无限缩短、自由时间的无限延长，在此基础上消灭包括资本私有制在内的一切私有制形式，建立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

参考文献

- [1] [加]莫伊舍·普殊同. 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M]. 康凌，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 [2] [古希腊]赫西俄德. 工作与时日 神谱[M]. 张竹明，蒋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 [3] [英]迈克尔·佩罗曼. 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M]. 裴达鹰，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4] [德]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阎克文，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 [5] [英]亚当·斯密. 国富论[M].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0] 周露平. 资本逻辑的哲学性质与历史限度[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2).
- [11][法]让·波德里亚. 消费社会[M]. 刘成富,全志钢,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12][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M]. 周延云,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资本论(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14][德]哈特穆特·罗萨. 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M]. 郑作彧,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 [15] 周露平. 《资本论》的反贫困哲学及其新时代价值[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12).
- [16][德]威廉·魏特林. 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 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M]. 胡文建,顾家庆,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17][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刘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Marxism's Workday Critique and Its Narrative of Liberation

ZHOU Lu-ping

Abstract: Capital comes into the world to create a new type of work with increasing wealth, equal work and freedom of opportunity. It is reflected in the modern labor in which workday is the measurement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Workday, as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was the technological design of the wealth of capitalist society. But the problem is that this workday is not natural and just, rather it is the time design and production system of capital power construction. The basic nature and specific content of the workday can not be clarified without raising the critical level of capital. Marxism entered the modern world and its production mechanisms directly from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 of capital, and questioned the nature of capital, the scope of struggle and the narrative of liberation in the workday; on the one hand, social union and free labor construct a mechanism of production that transcends the workday, that is, rebuilding individual ownership and blocking the workday as a time regulation for capital exploit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ranscend the logic of capital, eliminate the workday model and truly realize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Socialist China needs to bring into play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workday and create a social situation of glorious labor and hard work.

Key words: *Das Kapital*; workday critique; the nature of capital; liberation narrative; economic philosophy

(责任编辑 孙 洁)